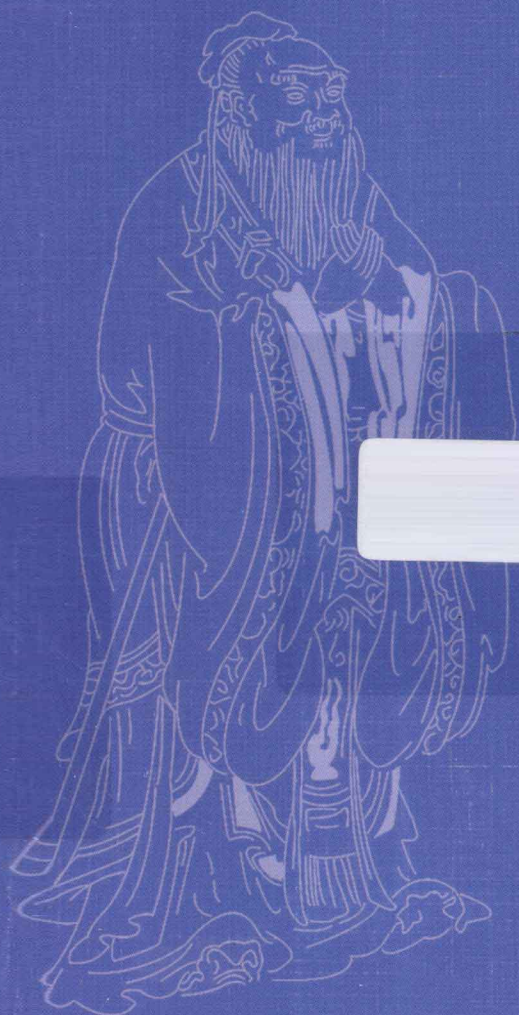


平視 孔夫子

伊人 著



凤凰出版社



平視孔夫子

伊人 著



鳳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平视孔夫子 / 房延军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506-1848-0

I. ①平… II. ①房… III. ①孔丘 (前551~前479)
— 人物研究 IV. ①B22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3649号

- | | |
|-------|---|
| 书 名 | 平视孔夫子 |
| 著 者 | 房延军 |
| 责任编辑 | 卞 岐 吴 琼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2号,邮编:221003 |
| 开 本 | 718×1005毫米 1/16 |
| 印 张 | 24.5 |
| 字 数 | 375千字 |
| 版 次 |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06-1848-0 |
| 定 价 | 45.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6-82328881)



平视孔夫子

——写在卷首

孔子被尊崇为“圣人”，已有两千多年了。

在历代遍立的孔庙(或称文庙、夫子庙)，“望之俨然”的孔子圣像，备享儒生士子、公卿政要拜祀如仪；旧时官学以及乡校，莘莘学子对“至圣先师”神位跪拜礼敬；至近几年来祭孔大典“猗欤盛哉”，仰瞻超规格超豪华“八佾”之舞，尤使恭与其祭者起敬起畏……这一切，似乎是天经地义。

然而，本书所谈说的，却是“平视孔夫子”。

对“圣人”孔子，竟不诚惶诚恐、仰而瞻之，这可以吗？

笔者认为是可以的。

且将“可以”之理由，先在此简略道来——

俗谚曰：时势造英雄。同样的，时势亦造就哲人。

孔子生当春秋之世。在此时世，王纲解纽，礼崩乐坏，“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是孔子感叹的“无道”之世。然而，正是表征为“无道”的空前的社会大变动，形成了当时“官学”式微、学术下移的时势，从而使时代的哲人及其学派有了自由生长的沃壤和空间。

在孔子之前，已不乏思想的前驱者，如周太史史伯，鲁国的臧文仲，吴国的季札，郑国的子产……他们都是当时的大学者(或兼为政治家)。跟孔子不同的是，他们多为贵族卿大夫，他们没有自立学派，他们的思想大多见诸《左传》、《国语》等典籍的记述。

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哲贤，有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史墨，郑国的邓析，还有道家的创始者老聃，等等。可见，在春秋之世，孔子不是横空出世者，亦非踽踽独



行者。

至孔子身后的战国时期，更是诸子辈出——墨翟、杨朱、孟轲、庄周、惠施、公孙龙、邹衍、慎到、李悝、荀况……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思想多产，智慧辉映。从春秋到战国，那真正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我们看到，在那“黄金时代”里，孔子是诸子之一，是哲贤之一，并非是唯一。

我们还看到，诸子中亦有不逊于或优于孔子的哲贤。

比如老子，他的深邃精奥的形而上哲学思辨，是孔子无以企及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道老子：“趋于深入的思维方式，对立与颠倒的思维方式”，“进入了世界的根源之中”，“老子的道是在超越了所有有限性时达到最深层次的宁静……”老子的《道德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亦是孔儒经籍不能比肩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之外，就是老子的《道德经》。

比如墨子，除了他的博识多能，其个人的人格和德性，亦为当世所公认且服膺。墨子恪守“君子以身载行”，为了践行道义的信念和主张，履危蹈险在所不惜，“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孔、孟名言）之于墨子，不只是堂皇的言词而已。《庄子·天下》虽批评墨子“以苦为极”，却也感佩赞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甚至连孟子都不得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比如庄子，秉持其独立人格，睥睨人间世的权势者，蔑视俯顺权势的奴才人格；坚抱其自由精神——“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显示出卓然于世的超迈；至于其文章的奇谲恣纵、深闳而肆，“晚周诸子莫能先”（鲁迅语），那就更不消说了。……

因此，回望两千多年前的华夏“黄金时代”——雅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我们眼里岂能只有一个孔子，而对若群星璀璨的诸子哲贤视而不见、漠视若无？

或曰：孔子是大圣人，诸子中的哲贤不能跟孔子同日而语，又怎么能将他们与孔子一视同仁？

我们知道，在孔子晚年和他离世不久，就有子贡等弟子喻赞夫子为“日月”、



“尧舜”，初现出圣化的端倪；此后孟轲、荀况等更造作渲染，强化孔子“圣人”形象。而孔子真正做定“圣人”则是在汉代。汉武帝刘彻初践帝位，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得皇家官方钦定，于是孔子名正言顺成为独尊的“圣人”。读史可知，西汉时相当多的儒生已然方士化，献策尊儒崇孔的董仲舒即非纯儒，乃是“儒家、经生和方士的混合体”（周予同语）。当时，董仲舒们不仅尊孔子为“圣人”，还奉孔子为“素王”，宗孔子为“通天教主”，将孔子抬到了吓人的高度。

于是便有讖纬之书应运而生。在此类书中，说孔子的母亲有一次在梦中跟黑帝交合，不久生下孔子，孔子既然是黑帝的后裔，所以又称为“玄圣”（玄者，黑也）。关于孔子因何降生于春秋之世，据讖纬书说，这是因为孔子奉上天的使命，担负为汉王朝“制法”的大任，孔子所作的《春秋》、《孝经》，就是其中两部“法典”。孔子后来携弟子在端门向上天“告成”，得到上天的启示：“宝文出，刘季握……”（刘季即刘邦）就这样孔子为三百多年后的刘氏王朝做了“先遣队”。诸如此类，离奇怪异，荒诞之极。

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曾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利用儒生们来创造有利于他自己的宗教，儒生们也利用皇帝来推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宗教。皇帝有什么需要时，儒生们就有什么供应。这些供应，表面上都是由圣经和贤传里出发的，实际上却都是从方士式的思想里借取的。”可见，圣化和神化孔子，其实不过是儒生和帝王之间相互利用而已。而那被圣化、神化了的“孔子”，跟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孔子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此，经学史家周予同说：“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假的孔子，而不是孔子的真相。”

眼里惟有被圣化、神化的假孔子，往往就容不下更多真实存在过的先秦哲贤，当然更不必说一视同仁了。

时至现代社会的今日，像孔子是黑帝之子、孔子为汉朝“制法”之类的呓语谎言，大概很少有人相信，也罕有人再张扬那样的货色了——虽然翻印的《孔子圣迹图》之类，有时我们还能看到。如今的学者无论怎样宗仰孔子，一般也不会像汉代的儒士和经学家那样，再把孔子说成神魔状的“通天教主”。但这并不妨碍有些学者继续塑造假孔子的事业。



历史学家朱维铮说：“历史上的所有假孔子形象，可以说都是某种特定的辩护论的产儿。”而近数十年来的假孔子形象则是出自“新辩护论”。新辩护论者看似与汉儒相反，要把孔子由神还原为人。然而，正如朱维铮犀利指出的：他们“预先假设这个孔子是个古往今来的完人。他们旁征博引，考订辨伪，在史料上花了莫大力气，想证明这一假设。然而，没有人能够离开自己的时代而从事思考与活动，也没有人能够超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所以孔子只能是历史的人，被春秋晚期鲁卫诸国实际生活进程规定了活动方式的人。在一切时代一切区域都是‘完人’的孔子，在生活中从不存在，或者说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他们没有使假孔子由天上降到人间，反而使人间增添了一个神灵样的假孔子，一个只有幻想的神才具有的超时空性格的假孔子”。真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事实上，孜孜于造作假孔子的，不单是那些“旁征博引，考订辨伪”以证明其“假设”的学者——毕竟他们还是认真下了工夫的——还有不少玩别的花样的、等而下之的新辩护论者，如穿凿附会，故弄玄虚；离析章句，妄作别解；无视常识，信口雌黄；搬弄“洋”学，生拉硬扯……如此这般，恣意涂抹，刻意包装，推出升级版“摩登圣人”或调制“心灵鸡汤”的假孔子。甚至有“学者”宣称，孔子倡言“宪政”，是“宪政主义”的祖师。汉代经学家让孔子奉天命为三百年后的刘汉王朝“制法”，现今的“学者”更了不得，竟要孔子提前两千四五百年为中国人创制“宪政”！

老的假孔子，新的假孔子，前赴后继，眩世惑众。但还是那句话：跟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孔子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若是不想被造作出来的新老假孔子眩惑，那就得让孔子真正地回归——回归为真实的历史情境中的人，即“被春秋晚期鲁卫诸国实际生活进程规定了活动方式的人”。

如此回归的孔子，没有涂抹粉饰，没有金铂华袞，没有“圣人”光轮、“素王”尊号，没有高踞圣坛神座之上，一句话，就是让孔子真正回归为孔子。

孔子的回归，无伤其伟大。孔子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哲人，他的一些睿智通达的思想、言说，无疑仍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当然，



同时我们也该记得墨子、老子、庄子、惠施等众多伟大哲贤，也该珍视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正是孔子及诸哲贤的思想原创力和各自的卓越贡献，共同造就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富饶丰赡和思想库藏的博大精深。

孔子回归为人——人性的而非“神性”的人，则孔子既特具其人性的卓异不凡，亦有七情六欲的人性之常，当然也难免会有人性的弱点；而作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孔子既有拔萃于世的光耀，同时亦不免于历史的局限。没有人性弱点和历史局限性的所谓“完人”，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圣人无谬”，这是自古以来造圣者编出来的神话。从《论语》等典籍可知，孔子从不承认自己是那种“圣人”。而墨子、老子、庄子等众哲贤，他们作为人性的人、历史的人，无一例外，亦是如此。

从圣坛神座之上，回归到人间大地的孔子，是我们可以平视的。平视孔子或别的哲贤，使我们能有理性的认知，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同时深怀敬意。

可以平视的孔子，较之只能匍匐仰瞻的孔子，哪个更接近于真实存在过的孔子呢？应该是前者吧。

因此，笔者起意要写这本“平视”的书。

在本书中，笔者勉力为之的是：以现代人平等的人格，理性的目光，平视孔子，而不是跪伏仰视；以平常心看待孔子，以平和的态度分析孔子，以平实的语言讲述孔子，力图呈现出一个本然的而非伪饰的孔子；并且对孔子儒学的若干思想命题，于平心静气的探究中，作出既不谀亦不诬的平正的解读论析。而这一切，都必以经籍原典为凭据，依循“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律则。言说的周密性，亦是本书所冀求，不过度阐释，不穿凿附会，不天花乱坠，不妄加发挥，不曲意掩饰，不恣意褒贬。笔者领教过有些巧言、高言、玄言乃至谎言的大著，时时以此为鉴。

漫漫两千多年来，国人（尤其是士人）磕头磕得够多了，精神的匍匐也够久了。我们该站立起来，我们该可以平视了。



目 录

平视孔夫子——写在卷首	1
卷一	1
学者孔夫子	1
先师孔夫子	11
孔子的“六艺”之教	24
行道者孔夫子	46
政论家孔夫子	76
异见者孔夫子	97
哲人孔夫子	110
性情孔夫子	141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154
卷二	198
孔子是怎么“圣”起来的	198
《论语》这部书	206
孔子的“理想国”	215
“己所不欲”与“己所欲”	222
隐,还是不隐,这是个问题	230
有多少“孝”今日可行?	239
夷夏之防:三千年的“意底牢结”	257
君子·小人·女子	277
从“不仕无义”到“官本位”	287



孔子及儒家的“不知”	296
孔子儒学和民主	312
卷三	332
孔子长什么模样?	332
孔子痛感于“好色者”	338
《春秋》为何特别青睐这个女人?	342
异哉“血性”孔夫子	345
孔子为何鄙视“言必信”?	349
孔子为何“叫停”子路行仁?	353
孝子曾参为何受责于“孝”?	355
先儒的哭丧之礼	357
喜闻新人向孔子“宣誓”	362
(附:关于“孔子出妻”的异说)	367
我在孔府买了本有意思的书	369
后记	377
主要参考书目	381

卷一

学者孔夫子

孔子首先是一位“学者”

掀开《论语》第一页，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

《论语》编纂者以这句话作为开卷之语，饶有意味。从这句话里，不难想象孔夫子溢于言表的欣悦之情。我们也由此获得了第一印象：孔夫子首先是一位学者——以“学而时习之”为莫大乐事的学者。

“学者”一词，如今是一种称谓，专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或造诣的人。然而在古代，“学者”的原初本义，则是指求学的人，比如《论语》中有句孔子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学者”就是指求学的人。本篇谈说“学者孔夫子”，也是以“学者”的本义而言。

我们知道，在与孔子同时以及其后的时代，有不少以学习为志趣的学者。如老子，《史记》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就是王室文献典藏馆的主管。整日坐拥书城，自然是他潜心治学的“近水楼台”，而一部《老子》则是其博学深思的灿烂结晶。又如墨子，有时远游别的诸侯国，车里满满当当装着书，有学生见而怪之，问为何“载书甚多”。他说早先周公旦白天读书百篇，自己又岂能懈怠？《庄子·天下篇》称墨子“好学而博”。还有一位以“车”载量的学者是惠施，也是在《庄子·天下篇》里，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这是指他学问广博，著作有五车之



多，“学富五车”这句成语就是由此而来。而庄子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其学无所不窥”，同样也是广为涉猎的博学者，而且当时那些满腹经纶的宿学之士几乎都曾受到他的批评。至于孟子、荀子、韩非等人，当然也同样如此。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诸子，无一不是孜孜不倦的学者。不过，像苏秦等辈那样做“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状，恐怕就说不上“不亦悦乎”，而颇有些自虐的味道了。

所以，孔子作为孜孜于学的学者，在先秦时代并不算特别的稀罕。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不说在百室或千户之邑，也不说是在鲁国，更没有说普天之下，而只是说在仅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没有谁比得上他好学的。夫子在自信“好学”这一点上，也相当地谨慎。

孔子的卓尔可敬，在于他是以身说“学”，孜孜而谆谆地倡导着一种“学而时习之”的精神。一部《论语》，“学”字出现六十四次之多，其中多数出自“子曰”。这在先秦的典籍中是罕见的（未记录在籍的孔子说学、倡学、劝学的睿语箴言，想必还不止这些）。孔子正是以自身敏而好学、学而不厌的风范，以及他所倡导的“学而时习之”的精神，垂范后世，感染、激励和陶冶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孔子靠的是“自学成才”

孔子没有上过什么重点小学，更没有上过名牌大学，孔子成为一位博学者，所凭借的乃是“自为学”（钱穆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学成才”。

我们知道，在古代没有“中学”，只有小学和大学。儒家经典《礼记》中说：“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按周代的学制，学生（当然全是男性）是八岁或十岁上小学，成年（一说十五岁，一说二十岁）入大学。然而这些小学和大学，无论是在周天子的王畿，还是在诸侯的封地，都是贵族子弟学校，孔子当时是没有资格进入的。虽然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是战功赫赫的武官，但正如钱穆所言，是“上不列于贵族，下不济于平民，亦是一士”。孔子三岁时，年近七十的父亲去世，没有留下什么家产，母亲颜徵在带着他回到娘家，孤儿寡母，生活较为拮据，而且社会地位低下，贵族子弟的小学和大学，对于孔子来说，当然是不得其门而入。

春秋时期，有些诸侯国设“乡校”，鲁国是否也有，以及孔子是否曾入乡校就读？不得而知。有作者说“孔子少年时上过一段时间的平民学校”，不知有何根据。《论语》研究家杨伯峻指出：“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因此，春秋时的鲁国在孔子创办私学之前，是否就有平（庶）民学校，这就很可怀疑。

《史记·孔子世家》记述：“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由此可知，孔子最初的“学”，是从孩提时的游戏开始的。只是他乐此不疲的游戏，不是捉迷藏之类，而是把祭祀之类的礼仪演示当作了游戏。这是因为孔子的母家乃士族家庭，亲戚多从事以相礼为谋生的儒业，孔子耳濡目染，发生了嬉戏仿学的兴趣，由此也可能隐萌了他日后的文化选择。孔子母家的男人（外祖父、舅舅等亲戚）多为有一定文化的“士”，因此他童年时很可能是从他们那里学会识字、记数，乃至初步接触到“六艺”的知识和技艺。

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表明孔子自觉自为的“学”，是从十五岁开始的。进不了贵族大学之门的孔子，自己潜心修习“六艺”课程。“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它们是当时大学的必修课，也是那时的儒者谋生、进身之术。以孔子的用功和颖悟，他对“六艺”的学习和掌握，必是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对于家境尚贫困的孔子，这些也曾是他谋生的技能，他当过管理仓库、出纳钱粮的“委吏”，做过主管牛羊放牧蕃息的“乘田”，可能还干过他所认为的其他“鄙事”，如为人治丧相礼之类。

后来里巷中有人似惋惜又似讥讽地说：“了不起呵孔子，学问广博却没有足以出名的专长。”（“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到之后并不介意，有点自嘲地说：“我专于什么呢？专于射箭吗？专于驾车吗？我还是驾车吧。”（“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再后来，有一位太宰却颇为钦佩地说：“夫子是位圣人吧，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的回答是：“我年少时贫穷，所以学会不少卑贱的技艺。君子需要这么多技艺吗？不要这么多的。”（“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可见，对于把“六艺”作为谋生的技艺，孔子内心是不满足也不满意的。

在“志于学”后的几年里，孔子又渐生了一种新的自觉，这就是：不仅把“六



艺”当作“艺”(技艺),而且更要探究其内涵,在义理的层面来认知、践行“六艺”(尤其是礼、乐)。这正是孔子此后孜孜以求的更高志向。

孔子“游学”问礼

孔子最为倾心、服膺的是“周礼”。

鲁昭公二年(前540),晋国的使臣韩宣子到鲁国,看到丰富的文献典籍,感叹说:“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礼》等典籍据传就是周公所作。孔子潜心研学周礼之后,对“礼”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他看来,“礼”不只是礼仪形式,不仅表现于器物,如他后来所说的:“礼呵礼呵,难道仅仅是指玉帛而言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更是一种典章制度,也是他心目中的“义理”所在。孔子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恐怕在相当程度上是就其学周礼而言的——周礼是孔子至死都笃信坚守的“善道”,既怕学不到家,更怕学到了又失去。

我们知道,孔子是殷商的后裔,他的先祖微子启是殷纣王同父异母的兄长,说起来殷纣王便是他先祖叔了。然而,孔子心仪的却是灭了殷商的周文王和周武王,笃学、信从的是周公之道。孔子晚年时甚至感伤叹息:“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呀,我已经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此可见,孔子对曾在梦中常见的周公是何等的景仰。

孔子在其办学授徒约四五年后,得到一次赴周朝都城洛邑(今洛阳)“游学”的机会。此事缘起于一位少年的提议,这位少年就是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儿子南宫敬叔。孟僖子生前曾嘱咐他的两个同岁的儿子何忌和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由此可见孔子办学不久就已有相当的名望了。据《史记》记载,南宫敬叔向鲁昭公提出:“请帮助孔子去周都吧。”昭公爽快应允,拨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还有一个驾车随从的仆役。《孔子家语》则指明,是孔子先向南宫敬叔表达了意向——自己想去周都向“博古知今”的老聃问“礼”。于是南宫敬叔便向昭公提出了请求,而且自己也随同前往,此时他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关于孔子向老子求学问礼的故事,曾有论者(如梁启超等)质疑,认为老子及其著作出自战国末期,因此所谓孔子问学之事不可信。但也有不少研究者予

以辩驳，以《庄子》、《礼记》、《吕氏春秋》等典籍都有孔子问学于老子的记述，足以参证此事确非子虚乌有，如儒学研究家徐复观就坚信于此。

孔子就“礼”的一些问题，向老子虚心请教，在《礼记》中对此有多处记述。老子既然主管着周王室藏书馆，孔子以为难得的机缘，要求阅读馆藏的文献典籍，想必也是可能的。临别之时，老子对孔子说：富贵者送人以财，仁德者送人以言，我不能使你富贵，我窃着“仁人”的名号，就送你以言吧。他送给孔子的一些处世哲言。孔子钦佩之至，后来对学生说起感受，把老子比作“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的龙。

孔子还访谒了周朝的大夫苁弘，后者精通古代乐理，又谙晓天文，孔子从他那里也获益匪浅。

在周都洛邑，孔子不暇优游观光，除了求师问学，他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为的是考察周朝的祭祀、宗庙以及礼仪制度。他在明堂里久久徘徊，瞻望着周公辅佐成王召见诸侯的图画，对随从者（可能是南宫敬叔）赞叹：“此周公所以盛也！”孔子后来经常梦见五百多年前的周公，可能就是这明堂壁画里的周公形象。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笔者揣想：夫子以“吾从周”为毕生衷愿，跟他周都“游学”的经历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两种“六艺”相辅相成

孔子“游学”周都后回到鲁国，其学问益进更为国人所知晓，因此前来投到他的门下求学的弟子也增多了。

第二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率师攻打季平子，反而遭到季氏和孟氏、叔孙氏三家联合攻击，昭公出逃到齐国的边境。孔子为避乱也来到齐国（这跟《论语》里的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正相一致）。在齐国约一年期间，孔子学习了《韶》乐，齐景公曾向他问政，这些且留在后面细述。

从齐国返回鲁国之后，孔子在此后的十五年里，一面自己深入修习诗书礼乐，一面给弟子们讲学授业。这里就要说到另一种“六艺”，在《史记》中有这一段话——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此段话的意思是：六艺对于治理国家，功用是相同的。《礼》可以节制人的行为，《乐》可以引发人内心的宁和，《书》可以指导人们如何行事，《诗》可以表达情感意绪，《易》可以窥知天地万物的变化，《春秋》可以从中悟察义理。

这段“孔子曰”虽不见于《论语》，但这“六艺”亦当是孔子自己学习以及传授弟子的课业。此“六艺”又称“六经”，与西周始设的学校教育内容“六艺”有差异，除了“礼乐”两项大致相同之外，其他四项都不同——两个“六艺”中的“书”也不一样，前者是指文字读写，后者则专指《尚书》。“诗”即《诗经》，“易”为《周易》，“春秋”则指孔子所修订的《春秋》，而孔子早先自学的，主要是《鲁春秋》——其修订《春秋》亦当是以《鲁春秋》为底本“笔削”而成。后代的学人说到“六艺”，一般都是指后一种“六艺”（六经）。而在孔子那时候，两种“六艺”相辅相成，都是夫子自学和讲学的科目内容。

孔子“学无常师”

卫国有个叫公孙朝的人问子贡：“仲尼焉学？”意思是孔子的学问是从哪个学府哪位老师学来的。子贡的回答是：“文王、武王之道没有散失，还在后人中传承着。贤者深悟其大道理，不贤者只知道些细枝末节。文武之道到处都有，夫子哪儿不能学呢？又何必一定要有哪个专授的老师？”（“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人家只问了一句，子贡却答了一通，而且话语里分明有点辩驳的意味，是不是不满于问者在怀疑孔子学历的正规呢？这是可能的。子贡这番振振之言，确是道明了孔子孜孜自学、学无常师的真实情况。

孔子没有“常师”，但又有很多的“师”。这些“师”中，有见不到面的，比如他内心追慕、服膺的文王、武王和周公；有能见到而得以问学的，如前面说到的老子。孔子一生中问学的“师”有不少，其中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而所有这些

“师”，孔子似乎都没有正儿八经行过什么拜师礼，然而只要遇到或闻知有可以问学的“师”，孔子总是不会放过的。

鲁昭公十七年（前 525），郈子来到鲁国，跟鲁昭公谈论到官名的问题。郈是个小国，依然保留着上古少皞氏以鸟为官名的规矩。“好古”的孔子听说后，马上去求见郈子，向他学习古代官名的知识。此时孔子二十多岁，其学识在鲁国已有些声望了，但对于遗存在远方小国的古代名物知识（所谓“学在四夷”），他还是学之惟恐不及。这个“问学”的故事记录在《左传》里。

在《论语》里面，记有一则“子入太庙，每事问”，说的是孔子初次进周公庙，对每件祭祀之事都要问个明白。当时便有人说：“谁说叔梁纥的儿子懂得礼呀，瞧他进了太庙什么事都要问。”（“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孔子听说后，说：“这正是礼呵。”（“是礼也。”）在孔子看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谦虚问学就是“礼”的体现。也有对此相异的解说，说孔子的“每事问”，乃是明知故问，意在讽刺“鲁太庙中多种不合礼之礼”（钱穆语）。这种解说未免牵强。《论语》研究者多认为，还是把它作为孔子谦逊好学的范例更为恰当。

孔子避乱于齐国时，听到《韶》乐，痴迷而又神往。《韶》相传是舜时的音乐，孔子对它的赞赏甚于西周的《武》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而《武》则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于是拜齐国的太师（首席乐官）为老师，向他学习《韶》乐。在学《韶》的日子里，孔子以全部的心神沉潜于其中，情不自禁地赞叹：“想不到享受音乐可以到达如此的境界呵！”（“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当时齐国人对孔子如此痴迷于学《韶》都称道不已。

后来孔子还跟鲁国的师襄子学弹琴，《史记·孔子世家》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述——在授艺的每个阶段，师襄子都悉心给以指点，而孔子则不以学会琴艺乃至领悟乐曲意蕴为满足，他还要在琴曲中追寻“人”（就像后来王国维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那种境界）……终于，他手抚琴弦，“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感奋地说：“我觉得见到乐曲中的人了，他的容貌黝黑，身材颀长，目光明亮远大，就像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不是文王又有谁能如此呢！”（“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听罢立即离开师者的席位，敬佩地说：“我说过这大概就是文王的乐曲呵！”

孔子学《易》，是在更晚的时候。《论语》里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